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2014

霍松林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名誉主编

霍松林
袁行霈
章培恒
王水照

主编

刘扬忠
钟振振
霍有明

执行主编
刘锋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6N000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

名誉主编 霍松林 袁行霈 章培恒 王水照

主 编 刘扬忠 钟振振 霍有明

执行主编 刘锋焘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25

插 页 4

字 数 770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613-1578-3/G·1135

定 价 100.00 元

发刊辞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镇。改革开放以来，在中文院系中更是学者最多，专家最多，学位点最多，研究成果也最多的一个学科。而且，有多个国家一级学会。但是，直至今日，尚无整体性的年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20 多年前，在霍松林先生的策划和主持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创办了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一个年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连出多卷，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队伍更加壮大，成果更加丰硕，信息量更加庞大，对于这些成果的整理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继承 20 多年前创办《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传统，筹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本《年鉴》的定位是：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本年度海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信息，总结成果，理出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既是总结，也是指南。

《年鉴》的具体栏目有：专家笔谈，学者研究，论文选粹，商榷与探讨，论文摘要，回顾与展望，本年度研究综述，新书选评，博士论文摘要，博士新人谱，学术动态，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著作）索引，学科点介绍，等等。根据当年的具体情况，会稍有调整。在各个栏目之中，除“专家笔谈”和“本年度研究综述”外，其他各栏都选刊本年度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而“论文选粹”和“商榷与探讨”尤其是我们重点建设的内容。

《年鉴》将定期出版，每年一期，每期 80 万至 100 万字。

《年鉴》的创办，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校方和文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全国古代文学界广大同仁的大力支持，众多的权威专家都愿意担任本刊的名誉主编、顾问、主编和特邀编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应该是古典文学学术界大家的刊物，需要整个学术界的扶持和努力，需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现在，有了这么多权威专家的加盟，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一初衷。于是，对这个重大工程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做个建筑工而已。当然，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好这个具体的建筑工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相信，在这个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有着整个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必定会越办越好，必定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对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

目录

200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发刊辞	1
一、专家笔谈	1
我的学习经历和体会 (霍松林)	2
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	7
二、学者研究	9
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黄仁生)	10
不傍古人著心史——严迪昌先生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马大勇)	17
三、论文选粹	25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尚学锋)	26
李林甫与盛唐诗坛 (丁放 袁行霈)	33
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 (王兆鹏)	45
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 (巩本栋)	58
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 (杨镰)	69
元末雅俗文化的交融与戏剧形态的蜕变 (张大新)	77
小说学的萌兴——先唐时期小说学发覆 (谭帆)	86
四、商榷与探讨	97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傅璇琮 吴在庆)	98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丁启阵)	106
关于“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再思考——与李昌集先生商榷 (岳珍)	113
五、回顾与展望	127
台湾宋诗研究的现况和展望 (张高评)	128
关汉卿研究的百年评点与未来展望 (徐子方)	137
20 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 (郭英德 王丽娟)	144
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蒋寅)	153
六、论文摘要	161
七、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239
《诗经》研究综述 (黄文熙)	240
楚辞研究综述 (唐景珏)	244
汉代文学研究综述 (耿志勇)	247
《史记》研究综述 (廖霞)	254
魏晋文学研究综述 (柳卓霞)	257

南朝文学研究综述(郭晓峰)	263
北朝文学研究综述(王爱科)	268
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聂永华)	271
李白研究综述(段慧冬)	277
杜甫研究综述(夏旭顿)	282
韩愈研究综述(殷海卫)	287
白居易研究综述(毛妍君)	291
唐传奇小说研究综述(梁瑜霞 邹援)	294
唐五代女性诗歌研究综述(郭海文)	297
宋代文学研究综述(李昶 欧明俊)	300
苏轼研究综述(史华娜)	306
辛派词人研究综述(朱慧玲)	312
南宋遗民词人研究综述(张秋娟)	318
元代文学研究综述(李志琴)	322
明代文学研究综述(吕益铭)	326
《三国演义》研究综述(潘晓玲)	331
《水浒传》研究综述(孙亚萍)	335
《西游记》研究综述(李艳梅)	339
前后七子研究综述(王祚良)	343
清代文学研究综述(贺 严)	346
《聊斋志异》研究综述(冯援援)	353
《红楼梦》研究综述(孙琳 夏雪飞 马晓侠)	357
赋体文学研究综述(高一农)	361
八、博士论文摘要	366
九、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375
十、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著作索引	529
十一、学术动态	548
十二、博士新人谱	556
十三、学科点介绍	56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	564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	565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	567
关于评选古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的公告	569
编后记	570

我的学习经历和体会

霍松林

我说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只谈一些学习经历，附带谈一些体会。

人类创造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像长江大河那样不断壮大，滚滚前进。因此，要谈治学，就不应忽视师承关系。而谈到师承关系，名师的指点和传授固然非常可贵，但是启蒙老师的作用也不应忽视。那么，我就先从启蒙老师是怎样给我“启蒙”谈起吧。

我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因家境清寒，13岁才上学，刻苦攻读，16岁就中了秀才，名列前茅。接着进陇南书院深造，很受名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任士言山长的赏识，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都得到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后，他回乡教书、种田、行医。我大约只有3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认字、读书了。那时候，他已不再教私塾。我们乡间办了一所初小，教员兼校长，就是他以前在私塾里教过的学生。他认为这位校长是他的学生中最差的一个，以己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因此，当我已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上那所小学，还是要我在家里跟他学。直到12岁，才把我送进离家15里路的新阳小学。因为他经过调查，知道这所学校的老师水平高，不至于误人子弟。

父亲的教学内容还是老一套，从《三字经》开始，由浅入深，无非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之类。但他的教学方法却不无可取之处。教认字，形、音、义都讲得很清楚。教书法，要求摆正姿势，正确执笔运笔，并学会分析字的间架结构。讲文章，不光说明大意，还从句到段到篇，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思路。讲诗词，则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都要求“眼到、心到、口到”（所谓“三到”），吐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韵。他是非常强调熟读、背诵的，理由是：一、幼年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一辈子都忘不了，受用无穷；二、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都是经验之谈；三、记忆力用进而衰退，经常背诵一些东西，记忆力就不断提高，反之，它就衰退了。

当我一个人被关在家里死记硬背那些不懂或不大懂的古书时，当然闷得慌，对父亲有

埋怨情绪。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对我的确很有好处。一、养成了背书的习惯,也积累了背书的经验,记忆力不断增强。进学校以后,所学的功课,都容易记熟。上课时我一边听讲,一边默记思考,当堂就基本消化、掌握了;有的课本读几遍就能背诵,学起来并不费劲。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有充裕的时间阅读课外书。二、童年背诵的东西当时虽然不懂或不大懂,但背过之后,就可以利用一切时间思考,例如在走路、干活、吃饭、穿衣、休息、夜晚睡醒以至于上厕所的时候,都可以“默诵其文,深思其义”,或遇到相关的问题,就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这样就逐渐懂了。又由于记得牢,懂了之后,就可以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如果不能背诵,那么一合上书本,就“无所用心”,学问也就难得长进。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培育了我广泛的学习兴趣。由此我深深感到,早年的“死记硬背”的确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关于熟读、背诵的好处还可以再谈一点。这种方法看似很笨,其实最巧。既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又有利于能力培养;既可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也可培养研究、写作能力和艺术感受力。三国时关中有位靠打柴谋生、自学成才的学者,名叫董遇,每当有人请他讲书,他总是说:“你先去读百把遍,如不懂,再来问。”那些人回去读,往往不再来问。因为一遍、两遍、三遍地反复读,原来不懂的也就懂了。于是他告诉大家:“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当然如果先由老师讲解,再去读,自然更容易些;有些需要考证或参阅有关资料才能看懂的问题,光读也不解决问题。但这都不足以否定“书读百遍”的必要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很耐读,如果你浅尝辄止,粗率地看一遍,那就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而反复读,熟能成诵,则其内容、情景就浮现在眼前,其结构、写法也了如指掌,有什么难点、问题,也一清二楚。在此基础上搞研究、写文章,往往能鞭辟入里,探骊得珠,不会给人以浮光掠影的感觉。而且,前人重视“读书变化气质”,读“好书”,时而高声朗诵,时而恬吟密咏,自然会陶醉其中而获得心灵上的滋养,精神境界因之扩大、提高,艺术感受力也会增强。学文学艺术需要较强的艺术感受力,而熟读、背诵优秀的文艺作品,则是培养的有效途径。

这几年,人们往往把中小學生语文水平低和大学文科学生高分低能归咎于“死记硬背”。我认为“记”和“背”还是很需要的,问题在于“记”什么“背”什么。现在从小学到大学,为了考试得高分,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而对于课文本身和必读的名著,则并不多看,更谈不上记和背,这当然没多大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汉语语法等,都是帮助阅读古籍的,但在不认真阅读古籍的情况下孤立地学这些东西,收效也不可能很显著。

以上就是我从早年学习经历中得出的第一点体会。

父亲有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是陇南书院任士言山长特意赠他的,他看得很珍贵。等我上初中以后,才交给我,并把他最得益的东西概括成几个要点,要我照办。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等等。一、三不必多说,所谓精读,就是熟读背诵,上面已谈过了。下面就第二个要点谈一谈。

到了六七岁,父亲就开始教我作诗作文。以眼前景、身边事为题,先要求造一两个句子;过一段时间,再前进一步,要求造几个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到了12岁时,勉强可以完篇。那时候,我基本上懂了平仄,也会对对子、写春联,但父亲并不让我作律诗,而要我作五古、七古和杂言体的歌行。理由是:先学律诗,束手束脚,不但律诗作不好,将来作

古诗,也格调不高。相反,先作好古诗,再“运古人律”,写出的律诗也神完气足,不同凡响。由于我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作文都打好了基础,一入小学,就上四年级。开始时有些课程还不适应,但很快就名列前茅,最后以第一名毕业,并轻而易举地考入了当时陇南14县唯一的一所省立中学——天水中学。

上中学后,我牢记着父亲的教导:读书、阅世、作文要相辅而行。读书有所得,阅世有所感,就构思属词,写出文章,使三者互相促进。就勤于写作这一点说,在上中学的6年里,除写了不少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当时的《陇南日报》、《天水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而外,还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说《易经》哲学思想的文言文,曾受到薄坚石、陈前三老师(后分别在山西大学和水师专任教)的赞许。上高中的时候,家乡的王新令先生从外地回家小住,从他侄儿那里看到我的诗文、日记及大小楷,便约我面谈。谈到写日记的时候,他强调要把每天的学习心得写上去,并要我读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和王门岂运的《湘绮楼日记》,以资借鉴。他和汪辟疆先生交好,因而介绍说:“汪先生每天晚上都用蝇头小楷记日记,把一天的治学心得都记上去,从不间断;他的《方湖日记》,也就是学术著作。”这些话,对我很有教益。从这以后,我每晚都坚持写日记,记上自己当天的学习内容和心得体会。当晚上感到没有什么可记的时候,就悔恨这一天没好好学,于是开夜车加以弥补。中学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和读书札记,曾在《陇南日报》副刊上辟《琐记》专栏发表。在中央大学上学期间,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卢冀野、唐圭璋、罗根泽、吕叔湘、朱东润、吴世昌、张世禄、吴组湘等许多老师都在那里任教,他们大多数都给我讲过一门或几门课;没有讲过课的,我也登门请教过。他们的著作,我是尽可能读了的。受教于众多老师,我自然获益匪浅。除增长真知外,在有关老师指点下,我经常写些旧体诗词和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多在《今代诗坛》、《陇铎》等刊物上发表),还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论文。其中在《中央日报》副刊《泱泱》等报刊上发表过的,有《杜甫在秦州》、《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高适》、《杜甫与郑虔》、《论杜诗的诙诡之趣》、《论杜甫的创体诗》、《杜甫诗论》等等。也写过些考证性的文章,有一篇《燕丹子考》,罗根泽先生很赞赏,特送给杨宪益主编的《人文》发表。这时所写的部分读书札记,曾在南京《和平日报》副刊上辟《敏求斋随笔》专栏发表。

从大学毕业以至于现在,除“文革”十年被迫停笔外,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中,我一直坚持写作和创作,从来不敢懈怠。我始终认为,勤于写作,就能把读书所得和阅世所感推向新的境界,而运用语言文字叙事、说理、抒情能力,也同时得到了提高。宋代有些理学家把作文看成“末技”,不加重视,是错误的。治学而轻视作文,懒得动笔,其结果是一方面学问很难长进,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由于缺乏写作锻炼而无法很好地表达出来,这于世于人,又有什么益处?后来我指导大学生和研究生,强调品学兼优、知能并重,要求他们做学问必须多动笔写文章,还应该兼搞创作。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了重要作用。要出成果,就要不断研究不断写作。而且,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应搞一点创作。比如讲汉赋,最好自己能作赋;讲诗、词、古文,最好自己能作诗、词、古文。当然不一定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会作,都作得好,但至少要有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研究打好基础。我带的博士生,

有不少会作诗词,会写文言文,研究与创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时下提倡素质教育,我认为强调品学兼优、知能并重,也可以算做素质教育观。这是从我的学习经历中得出的第二点体会。

大学毕业后,我应陈匪石师之约,到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任教(陈先生时任系主任),后又到天水师范学校任教。1951年初,接到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聘书,到该校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任教。由于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我自幼爱好文学,更爱好中国古典文学。上大学后跟朱东润先生学《史记》,跟罗根泽先生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跟胡小石先生学《楚辞》,跟汪辟疆先生学历代诗和目录学,跟陈匪石先生学宋词,跟卢冀野先生学元曲……主要精力,都用于学古典文学;在报刊上发表的,也主要是诗、词、曲方面的习作和评论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文章。在重庆南林学院教书,担任的课程也是历代诗选、基本国文和中国文法研究,但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领导上派给我的却全是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解放初还沿袭旧型大学的办法,一位专任老师必须同时开三门课)。这几门新课,在当时不要说没有教材、没有教学大纲,就连必要的参考资料也十分缺乏,对于我这个基本上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学,我毫无基础,可供参考的新书更少得可怜,记得只找到一本巴人的《文学初步》,算是用新观点写的。既没有现成饭可吃,就只好自己动手,边学边教。在文艺学方面,我反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拟出讲授提纲,然后阅读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运用多年来积累的文艺知识,参考《文学初步》和报刊上新发表的有关文章,一节一章地编写讲稿。到1953年秋天,几经补充、修改,数易其稿,定名《文学概论》,约有30万字,由学校打印,作为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1955年,我校创办函授教育,又被选作函授教材,由函授部分上下两册铅印(说到这里,我还算是最早就和我校成人教育有缘的教师)。1956年,我又参照刚拟订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加工,改名《文艺学概论》,因供不应求,由校方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多兄弟院校曾把它作为文艺理论课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有学者来信说:“您是我国第一个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是不是“第一个写”,我不敢肯定,但在解放后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中,我的那部《文学概论》却是最早的。

在文学概论课的讲稿作为交流教材印出后,由于古典文学的教时增加,领导上又派我教元明清文学,后又陆续教过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一度还教过古代文论选。总之,直到“文革”前,我一直跟着教学任务跑,先后教过七八门课。在教学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我还是出版了8本书,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有人问我:“你哪来的时间搞出这么些科研成果呢?”其实很简单,原因就在于我没有把教学与科研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对我来说,教学也就是科研。每教一门课,我都认真备课,根据教学需要做点研究工作,写出讲稿,然后反复修改加工,直至写成文章、写成书,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学水平也自然得到提高。所以教学内容也就是我的科研内容。我教什么,就研究什么,能将二者统一起来,互相促进。比如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再版的《西厢记简说》,就是为搞好《西厢记》教学而写的讲稿。其他著作及论文,大多数也是在所教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所以我总是说:我的工作任务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也可以说是再学习。这就是我的第三点体会。



其实,这也并非我的发明创造。大家知道,叶圣陶、夏丏尊的《文章例话》,就是他们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时写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都是他在大学讲课时的讲义。许多著名教授,都是每开一门新课,就写一部专著或若干篇学术论文。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年轻教师和成人学员正确处理学习、研究和工作的关系,也许是有用的,但我当年却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被人误解为“开地下工厂”、“不务正业”,在1957年以后的历次学术批判运动中,我都被当作“厚古薄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受到批判。“文革”一开始,更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碑帖、字画、手稿和万卷图书,被抄掠一空,关牛棚、批斗、劳动改造整整达10年之久!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劫后余生的我“春风吹又生”,近20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最后我要给同志们尤其是参加继续教育的学员朋友们谈的一点体会是:要刻苦自学。

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家父的启蒙和老师的教诲培养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从来没有忽视自学成才。12岁以前,我是在家父指导下自己读书的。上小学以后,各门功课都学得有兴趣,尤爱语文。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自觉撰写发表文章,大量自学课外书,迷上了文学,欲罢不能。上大学时,课余常到老师家里漫谈治学问题,不少老师不要求我去听他们的课堂讲授,而让我自学,写心得体会和学术论文。例如朱东润先生讲《史记》,罗根泽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史,汪辟疆先生讲历代诗选、目录学和《玉溪生诗》,我都由于他们的特许,很少去课堂听讲,只凭自学笔记和学术论文就拿到了学分。我认为,我从幼年就培养了学习文学的兴趣;中学时期,课外的自学和写作较多;大学阶段,又在名师指点下结合自学搞科研;这是我能较快地练出基本功,获得独立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能力的主要原因。从我的经历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即使是名师真传,也不能保证工作所需和一生享用,仍然要靠自学,要学会自学,继续学习,不断学习。因此我一贯认为,自学是成才的必由之路,并就此专门写过文章。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和学习化社会即将到来的今天,知识老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师不搞科研,知识如何更新?学生只带着一双耳朵听讲,即使老师讲的是新知识,再过几年也陈旧了,不能适应毕业以后的工作需要。因此,我们的学校,包括继续教育学校,应该从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培养能力为主。用教育学的术语说,就是要善于将学生的间接兴趣转化为直接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应适当减少教师的讲授时间,增加学生的自学时间和科研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学和科研,尽快使学生练好基本功,从而获得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这样才能不断地更新知识,赶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

以上谈了一些经历和体会。经历,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请读者自己去抉择。体会,当然难免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

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出，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中，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于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阕有曰：“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其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对资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有气象的学问亦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白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拓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此外，如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其发凡起例之功也都是学界公认的。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



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淹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辩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异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在宽容中透出恢弘的气象！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余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共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援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着他的手迹一边想像他的心肠，感动之余更增加几分钦佩。

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借以自勉。





学者研究

研究

五、创作层面《都市异想》是陈鹤平于1998年从张发荣家个画展中受于关蒂从立画走出的章大西的高景梅姐分替书关做其口翠木荣加替替想。知崇为首创张发荣实替张册是由何同全式。张册由人籍面张系替人天画，翻回本册等张替替想。高文平主创其期关首册，家曲张百内张替替想，排竟品早置大概重到张替替想。张南、京北去替自替式册，排林手一替替替想，张替替想替真后张替想，叫张南出“自作自替”替替想。合张完平1993张王替，替替想正，替替想月替，替替想关式家，张替替想替。张替想个，替替想替替想。张替替想替替想而全替替想不替系一丁出替替想由张替替想替替想。高文《张替替想》替替想“久以张替替想替替想替替想。”替替想“刀替

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

——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黄仁生

章培恒先生以文学史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是近八年间的事；此前几十年他以兼擅考证和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实际上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且正是随着这种对文学史上重要个案研究的不断拓展和积累，才使他萌生了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并进而在写史的过程中得以凭藉其实证研究和理论剖析的双翼而独树一帜。

章先生今年70岁，自1954年1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以来，如果略去因政治造成的损失不计，已从学50年。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本文拟着重结合前二类成果，分别就其实证研究、理论阐释和文学史建构的学术成就略加述评。

一

章先生独立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开始撰写《洪昇年谱》而起步的，这同时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次尝试。尽管当时学术界已开始关注清代成就最高的两大戏曲家，但有关洪昇的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基本问题，尚无人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后自费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搜集到大量罕见资料，然后辨伪订误，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引用书目”达246种，通过认真考证和排比，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而且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独到的看法,把对洪昇及其剧作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17年之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当时仍属于学科前沿性质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扬它“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之后,章先生继续瞄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上溯先秦两汉,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上下求索,仅就微观考证而言,就发表三十多篇论文。由于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论挑战,或与时论相左,或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不仅促使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后来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

就微观考证的对象而言,首先集中于本来资料匮乏的小说研究中的一系列个案上。具体地说,主要围绕六大名著的疑难问题提出新说,受到质疑时或发现新的资料后继续向纵深开掘,因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每个专题都累积起一组既前后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文章。一是考证《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撰有《聊斋志异三会本·新序》、《〈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再谈〈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问题》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后人所编,唯原稿本共八册,是作者按写作先后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册虽已佚失,但通过对铸雪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订出正确的次序。然后考定该书前后写作历四十年余,并进而推考出原稿各册写作的大致年代。正如英国学者白亚仁所评:“章氏的论点遇到各种反响,有些表示支持,有些表示怀疑,然而它有效地重新开展了有关《聊斋》写作年代的整个讨论。这一问题包含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极有助于认识作者生活与文学活动及创作发展之间的关系。”(白亚仁撰《〈聊斋志异〉文本的演变》,原载1984年12月版《哈佛亚西亚学报》)二是考证《儒林外史》的原本卷数,先后撰《〈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三文,认为事实如程晋芳所说原本为五十卷,而金和所说原本为五十五卷虽不足信,但其谓“幽榜一卷”即通行的五十六回本的最后一回为后人妄增却是可信的,再进一步考出五十六回本中后人窜入的另外五回的具体内容和分布位置。三是考证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先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认为吴承恩所撰的《西游记》只是一部游记类的书,与小说《西游记》名同而实异。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震动,苏兴、谢巍等随即撰文商榷。于是又撰《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予以答辩,徐朔方、黄永年、张锦池等也相继撰文声援,促使学术界不能不重新探讨《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四是考证《封神演义》的相关问题,共撰《〈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二文,分别对鲁迅定作者为许仲琳、写于隆庆万历间和柳存仁等主陆长庚作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该书原是流传于“说词者之口”,后经许仲琳、李云翔写定,而且李云翔是主要写定者,最后的写定时间在天启末年。五是考证《三国演义》的写作年代,先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根据书中所附“今地名”小字注,首次考定该书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前,竟引发了一场长达多年的争论。稍后连撰《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三文分别对周楞伽、王长友、张国光等人的质疑作了答复。后来由于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所刊《三国志传》的发现和影印以及明代黄正甫所刊《三国演义》